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女性移民研究回顾与思考^{*}

陈 雪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面对全球治理议题所发出的中国声音。性别平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事业的实践与发展,又展示了中国对全球妇女发展事业的深度参与。全球女性移民作为移民问题和妇女发展交汇的治理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亟须聚焦的群体。国际学界以移民女性化趋势为切入点,使移民研究在跨国空间中,从无性别视角过渡到性别化研究的新阶段。而作为国内人口流动大国,我国大陆学界在农村向城市流动妇女研究中产生丰富成果,也应该与边境地区的跨境妇女流动研究、台湾地区的女性移民研究一起被纳入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内涵中,并通过与台湾开展女性移民研究的学者交流对话,搭建跨越海峡两岸的移民研究共同体,扩大女性移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积极吸纳国外最新理论和方法,最终构建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性别;女性移民;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8)03-0148-09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性别平等意识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治理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铸就了辉煌的中国篇章,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万隆会议以来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延续,明确了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又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四个自信”之上,面对全球化时代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情势,中国人民将国家梦想与世界梦想联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创新和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学者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背景、内涵、实施的过程、目标以及原则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干春松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里灌注互助和礼让的价值,并建构起天下一家的新共同意识”^①。徐艳玲等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新型文明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能对内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对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新型文明样态。^②郭楚等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为一个社会建构概念,它区别于以往社会学中的共同体概念,从建构领域来看是一个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合作、安全合作直至观念统一的渐进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从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到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空间上由小到大,时间上需要长期奋斗的建设过程。^③于宏源也强调人类

* [作者简介]陈 雪,女,云南文山人,云南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移民性别化、移民与发展、移民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2017年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全球照护链视野下的澜湄区域女性移民研究”(17YNUHSS020);2018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区域跨流动妇女发展研究”。

① 干春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2).

② 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6,(3).

③ 郭楚,徐进,打造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分析方法与建设路径探索[J],国际安全研究,2016,(6).

命运共同对西方传统共同体理念的超越,是对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强调尊重成员国主权,照顾成员国舒适度,不提出超过成员国发展阶段的目标。^①刘传春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系统建设工程包括了3个统一:一是精神共同体(认同)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二是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统一;三是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全球治理观的统一。^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面对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全球治理、环境、发展、反恐、防扩散、维和、妇女等世界最重要的议题时,结合中国经验和世界形势发出了中国声音。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建立在两性平等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共同体,性别平等意识根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价值体系中。

首先,这种性别平等意识来源于指导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有5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必将被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男女平等所取代;其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被压迫地位的实质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其四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五男女两性都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法律规范和道德风尚。^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我国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智慧,体现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对妇女解放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升华。

其次,这种性别平等意识延续了1995年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所提出的“将社会性别纳入主流”,也就是性别主流化(gendermainstreaming)策略,即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从国家立法、政策、项目的制定到评估和实施的全过程都考虑两性的关注与需求,从而使性别主流化成为推动和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最有效的手段。我国早在从1954年建国初期就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1995年世妇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契机,将性别主流化策略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融合在一起,伴随2005年我国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条例,再到2012年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得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体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完成了从“政府承诺”到“立法确认”再到“执政党意志”的全方位确认,这个过程中我国确立了将男女平等作为我国一项整体的、长期的和根本国策,为解决新时代妇女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保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强调构建两性平等的共同体,但这个性别平等的共同体又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者所倡导建立的战略性姐妹情谊(strategic sisterhood)。战略性姐妹情谊是由西方精英女性主义者提出的一种基于北-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战略性发明”,旨在给予第三世界受压迫的妇女学术和道义上的支持,帮助其对政府进行施压,以期促进第三世界妇女权益提升。^④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性别平等观,一是不同于战略性姐妹情谊所依托的西方个体主义精神对跨国女性身份和公民身份的阐释基础,更重视妇女地位形成的历史、文化、国族和社区基础;二是不同于战略性姐妹情谊忽视第三世界妇女群体内部之间包括阶层、宗教、意识形态的具体差异,抛却妇女生活的具体场域而进行的无差别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性别平等观发端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事业的自我探索。这条独立的发展之路使其坚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礼俗制度,在各国内部特有的文化网络中去寻求符合各国国情的妇女发展道路。性别平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它的实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着眼于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建设全球范围内支持女性发展的环境,以及自我能动性施展的公平空间;另一方面重视女性群体内部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针对特定群体,特定

① 于宏源.权威演进与“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设[J].社会科学,2017,(7).

② 刘传春.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质疑、争鸣与科学认识[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1).

③ 江泽民.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N].人民日报,1990-03-08.

④ Ong, A..Strategic Sisterhood or Sisters in Solidarity? [J].Questions of Communitarianism and Citizenship in Asia,1996,(1).

的文化情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给予特别的支持和辅助,增强其向上流动的能力。

性别平等观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整个形成、深化和实践过程中,向内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事业的实践和发展;向外立足于我国在全球妇女发展事业中更深层次的参与。2015年,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各国各地区妇女发展水平仍然不平衡,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仍然不平等,社会对妇女潜能、才干、贡献的认识仍然不充分”,而中国将通过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以及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这4个方面来为全球男女平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这一全新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理论构想与行动指南,更是新时代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由中国走向国际的理论实践。

二、全球移民女性化趋势与国际研究

全球治理在今后一段时期面临两个大挑战:一是由于全球范围内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地区、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结构失衡,二是文明冲突,主要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主。处理好人口流动尤其是国际移民问题是解决这两个挑战的关键。^① 伴随着国际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女性移民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起也出现了剧增。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国际移民的女性化趋势(feminization of immigration)。通过对比2015年与2000年的统计数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移民从2000年占移民总人口的49%降至2015年的48%,与此同时,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北美洲和大洋洲女性移民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男性移民的增长速度。在亚洲和非洲,女性移民的增长速度和数量却远不及男性移民,对比2000年与2015年的数据发现,亚洲女性移民在亚洲地区移民总人口的占比从2000年的45.6%降至2015年的42%,但亚洲移民女性人口从2000年的220万增长到了2015年的320万。^② 虽然女性移民的增长速度整体上落后于男性移民,但女性移民人口数量整体上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此外,还有大量的妇女在国家内部,完成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在全球化进程下,一方面女性移民摆脱了之前作为尾随配偶的移民依附者形象,作为独立的劳动力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对家庭、输出和输入两个社会的贡献不断被识别,女性在迁徙过程中能动性的施展、自主性的增强也得以体现,迁徙成为女性向上流动的一个机遇与渠道。但同时,女性移民还是脆弱的移民群体中的更脆弱者:既容易成为被迫移民(forced migrants)遭遇国际人口拐卖,或者沦为难民;又在迁徙过程中更易受到来自跨国结构、性别、种族/族群、阶层、国籍、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结构交织性压迫,生存和发展遭遇极大困境。^③ 因此,如果说移民问题是当今全球治理中的一大难题,那么女性移民问题就是这个难题中最核心的部分。

“移民女性化趋势”的提出,是全球化移民浪潮中女性行动和贡献可视化(visualization)的一个过程。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显示,过去50多年来,女性移民始终占据着移民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但由于在认知论上,对移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基于一种无性别的视角(ungender way),^④大量的研究关注作为移民劳工的男性,包括劳工的历史,以及男性劳工作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贡献等,女性移民者则成了研究盲区。在这一研究趋势下,移民逐渐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男性移民为主的独立、主动移民,另一种是作为伴随者的移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女性因此被框定在被动的、不独立的尾随配偶形象中。对女性移民学术关注的缺席一直持续到1970年中后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移民才

① 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1).

② UN(United Nation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R].New York: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16.

③ 陈雪.多元交织理论框架下的女性移民健康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国流动妇女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7,(1).

④ A Pérez Orozco, D Paiewonsky, & M García Domínguez. Crossing borders II: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R].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2010.

因其在经济活动中更大的参与度和性别研究的发展,逐渐以独立移民主体的身份得以发现。^①

女性移民沦为移民研究盲点的原因,不仅只是因为她们的依附者地位,更与她们所从事工作领域有关。女性移民大都在边缘的经济领域从事非正规或低技能工作,如家事劳动、娱乐-性产业,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加工行业,社会可视化程度较低。加之女性劳动力移民具有公认的“沉默驯顺”特征,更使得她们成为被遗忘的群体。^②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妇女以平权运动为路径,推进自我在公共领域的全面、平等参与。职业母亲群体的扩大改变了家庭内部空间结构。为保证西方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再生产得以有效进行,一种新型的跨国分工格局得以形成,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涌入发达国家,成为市场化的再生产劳动工作者。^③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伴随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传统家庭结构也逐渐在消解。女性移民由此进入移民研究的学术视野中,成了研究的焦点。因此,总的来说,伴随女性移民迁徙类型、途径、主体性彰显程度的动态变化,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经历了从学术缺席,到框定为被动尾随者,再到被识别为全球劳动力新市场中的主角这一系列发展过程。

提及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发展历程,不得不提及性别与移民两个研究视域的交汇与互动,在性别与移民研究各自的发展与跨学科交融互动下,移民女性化研究已成为了一门显学,无论是理论工具的生产、女性移民权利和地位的提升,以及国际化的实践合作上都有突破性的进展。作为全球移民女性化趋势最主要的研究贡献者,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者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的历史交汇点上,一方面承袭了第二次浪潮的倡导性基础结构(advocacy underpinnings),^④既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分析框架,关注移民妇女在流动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又定位于政策导向,着力于探讨妇女的参与、权利,以及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贡献,对促进移民妇女状况的改善提出具有主导性和介入性的建议;另一方面又跟随第三次浪潮对于跨越性别、族群、文化等多重交织边界的尝试,将性别作为一个中心分析视角,分析微观、中观和宏观过程,同时将社会阶层、族群、年龄、性向等一起纳入分析框架中。将性别作为一个变动、灵活的结构来分析移民过程。

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擅长的整体分析(holistic approach)研究框架下,研究者们通过全球照护链、女性移民汇款、身份与权利等一系列理论工具的提出,把性别作为第一位的结构变量(first-order structural variable),将移民同时置于本地、国家、区域,以及全球这4个由大到小的空间范畴中进行考量。^⑤进入千禧年后,伴随性别主流化得以透过联合国倡议,在各个国际组织的政策纲领中广泛覆盖,并由此促进了国际组织对女性移民及其发展问题的关注。例如2000年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宣言》就将性别平等与保障妇女权益写入千年发展目标。4年之后,联合国再次推出《妇女与国际人口流动:关于妇女参与与发展贡献的世界调查》(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强调女性作为国际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需推行具有性别针对性的移民政策来赋权移民女性,尤其是作为难民的移民女性。2004年还召开了“妇女流动与新型国际分工”会议(Conference on Female Migr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发展实践家,以及女性主义活动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移民女性化,国际政策形式、具体情形下女性移民的生活经验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促进了有关国际分工、充权和剥削等研

① 陈雪.国外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J].妇女研究论丛,2016,(4).

② Mary Beth Mills.Thai Women in the Global labor Force:Consuming Desires,Contested selves[M].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9,114.

③ Fiona William.Migration and Care:Themes,Concepts and Challenges[J].Social Policy & Society,2010(3).

④ Emilie Hafner-Burton,Mark A.Pollack.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Global Governance[J].Feminist Legal Studies,2002,(3).

⑤ Jane Lewis.Gender,Ageing and the “New Social Settlement”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Care Policies[J].Current Sociology,2007,(2).

究关键词的概念化。^①

在联合国与国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尽管移民问题本身依旧是一个全球治理中涉及国别政治、双边、多边和区域关系的复杂议题,但女性移民研究还是冲破了国家边界的藩篱,得以在一个跨国视域下进行探讨。并通过国家内部政策的调整,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各个层级的国际组织、区域妇女、移民保护组织、本地化的草根组织有针对性的专题和项目支持等一系列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特定国家/地区的女性移民在身份、权利以及生活和发展状况上获得了改善。然而,同时也应该重视,全球女性移民研究还面临 3 个尚待拓展研究的问题:一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南北流向的女性移民及发展研究,仅有少量研究关注南南区域内部的妇女流动及发展研究;二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国家之间的妇女流动,缺乏区域研究的整体视野;三是现有研究,尤其是有关女性移民的政策研究主要以移民接收国为主,缺少在移民输出国视域下,针对女性移民输出前与返乡后的相关研究。

三、中国学者开展的女性移民研究脉络梳理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移民研究就开始进入西方传统移民接收国各个学科的研究视域内,并由此产生了丰富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一个事实是:无论哪个范式的移民理论,都没有对国内与国际移民研究进行区隔,因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人口流动,都是由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驱动的过程。而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国内人口流动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国际人口流动。恰如学者 King 和 Skeldon 所说:“两种人口流动现象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一国农村-城市人口流动还往往是边境地区跨境流动的序曲。”^②作为全世界国内人口流动数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国内的城乡人口流动研究是全球移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对于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贡献就研究的地域空间而言,主要有 3 个部分组成:一是内地以农村-城市为主导流向的妇女流动研究;二是对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开展的研究;三是以台湾地区为接收地的女性劳动力和婚姻移民研究。

(一)农村-城市妇女流动研究

1995 年世妇会的召开,可以作为一个时间坐标,将国内农村-城市女性移民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中的妇女成了国内人口流动中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与国外早期移民研究中女性移民“缺场”的情形不同,国内人口流动从一开始就将妇女移民纳入到了研究场域中。只不过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的只是将两性性别作为一种选择女性流动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分类方式,在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的大背景下,聚焦于流动带来的女性移民在生殖健康、婚姻、生育状况等人口学特征的变化关系。^③也有少量的研究开始关注由西部向东部,农村向城市妇女婚姻迁徙现象,^④并由此注意到妇女流动过程中的人口贩卖问题,^⑤以及移民妇女在城市中的双重边缘角色。^⑥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已将流动的妇女定位于主动的劳动力移民,肯定了农村女性移民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同时作为农业生产力 and 城市经济的劳动者和创造者的价值与贡献。^⑦

第二阶段是世妇会召开后,社会性别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完成了引入和逐渐普及的过程,国内城乡妇女流动的相关研究,也得以透过性别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出现了 3 个显著的特点:一

^① Petra Dannecker, Migrant visions of development: a gendered approach[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5).

^② King, R. & Skeldon, R. "Mind the Gap!" Integrat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0, (10).

^③ 田心源. 人口流动·妇孕生育孩子变[J]. 中国人口科学, 1990, (4).

^④ 张和生. 婚姻大流动: 外流妇女婚姻调查纪实[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36.

^⑤ 庄平. 关于我国买卖妇女社会现象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1991, (5).

^⑥ 啸天. 都市边缘女[J]. 妇女研究论丛, 1994, (3).

^⑦ 孟宪范.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J]. 社会科学战线, 1993, (4).

是研究的议题和内容得到了扩展和深化,二是研究理论和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三是与国际移民性别化研究的发展轨迹相似,从关注流动中的妇女过渡到聚焦流动中的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研究。

首先在研究的议题和内容上,国内学者除了继续关注流动妇女的健康研究之外,更对女性移民的社会权利与社会保障、①职业流动与个人发展、②人格塑造与心理健康、③家庭暴力问题、④贫困与减贫⑤等与流动妇女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拓展研究。研究者也不再局限于将流动妇女作为一个均质化的群体进行研究,而是针对女性移民特定的族群身份、从事职业,以及年龄等多重身份,在不同地域空间下开展研究。⑥其次,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尝试与国际接轨,采取了一些性别研究中的经典理论工具,在本土女性移民研究中广泛使用。例如伴随1960年代起在联合国和各个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妇女参与发展”(WID)过渡到“妇女与发展”(WAD),再到今天的“性别与发展”(GAD)3种妇女发展研究范式得以产生和融合,国内学术界也积极地将这3种研究范式运用于农村-城市的妇女流动研究中,关注妇女在迁徙过程中的能动性施展、家庭贡献,以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⑦此外,在性别研究中国化与国际化的互动中,学者们也进一步拓展了研究对象的范围,除了继续以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之外,还通过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分析农村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在家庭中决策权力的影响;探讨妇女流动引发的母职缺席,随之而来的留守儿童的照料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杜平在她出版的最新著作中,还将多元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作为分析工具,探讨男女两性农民工在阶级和性别交织的社会背景下,在私人家庭、农村社区空间和城市空间的选择与生存。⑧

(二)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与老、缅、越三国,以及东北地区与韩国的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已成为边疆地区跨境人口流动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并形成了各级政府调查组织与学者相融合的研究力量。大部分对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问题的描述和分析,呼吁从顶层设计上构建我国移民法成了大量学者的一致表述。

一是对跨境婚姻移民剧增现象的产生动因,大多借用19世纪地理学家Ravenstein在做关于“迁移法则”研究时首先提出的推-拉模型(push-pull model)分析跨境婚姻移民人口流动的供求关系,并认为包括移民法律和个体因素在内的输出国与我国作为移民输入国之间积极和消极的因素是造成移民的根本原因。⑨事实上,作为有关移民研究最早的理论模型之一,推-拉模型存在的缺陷已被当代移民研究者反复指出,推-拉模型仅仅指出了影响移民迁移的一组动因,却未对各个因素在移民迁徙结构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给予严谨的阐释,缺乏准确清晰的研究机制,国外移民研究者已一致认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理论,而仅仅只是一种研究模型(model)。因此再采用这一理论模型分析我国当前的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无论是从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与当前国际移民研究,尤其是移民的性别化研究形势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二是将跨境婚姻现象放置于族群、文化和地缘接近性中探讨跨境婚姻形成的动因。这种将跨境婚

① 陈爱萍,宋运英.浅析妇女流动人口劳动保障的措施[J].政法学刊,2003,(6).

② 孙琼如.外来农村妇女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泉州市流动人口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7,(4).

③ 刘越,黄慧娟,林朝镇,尹勤.竺波流动妇女人格特征与心理健康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10,(5).

④ 孙峰,楼超华,程艳,涂晓雯.上海市流动人口已婚妇女对家庭暴力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J].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2012,(3).

⑤ 张晓颖,冯贺霞,王小林.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基于北京市451名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调查[J].经济评论,2016,(3).

⑥ 杨国才.边疆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特征及变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⑦ 罗桂芬.农村妇女劳动力主体能动性发挥与农村社会发展[J].管理世界,2001,(5).

⑧ 杜平.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124.

⑨ 戴波.中缅、中老、中越少数民族跨境婚姻行为的经济学思考[J].世界民族,2016,(2).

姻移民放置于特定空间进行探讨的方式,能够对跨境婚姻移民形成的时空文化延续性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剖析,但却不能解释跨境婚姻移民形成阶段性一边倒增长趋势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类研究大都集中于跨境婚姻移民的族群认同身份,而忽略了婚姻移民以女性为主体的性别化身份,也忽视了婚姻移民处于社会底层空间迁徙的阶层化流动特征。^①

三是在跨国主义研究框架中展开对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将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放置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和资本的区域性流动中进行探讨。^②这种研究倾向已经尝试将婚姻移民现象放到了一个相对宏观的区域化视阈范围内进行探讨,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来探讨跨境婚姻移民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动因。但这类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了以女性为主体的跨境婚姻移民的主体选择性。

四是将跨境婚姻移民人口增长视为我国性别人口比例失衡的一种解决途径进行描述分析。这也成为了解释跨境婚姻现象“合理性”的一种普遍观点。^③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婚姻移民剧增现象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忽视了跨境婚姻移民作为劳动力的一种补充形式流入我国边疆地区这一根本动因。

五是从法律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探讨跨境婚姻移民对边疆治理造成的冲击,以及跨境婚姻移民“非法性”身份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对跨境婚姻移民家庭自身发展,尤其是对婚姻移民子女成长带来的影响和困难。^④但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忽略了婚姻移民在新生家庭和当地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与贡献,未从跨境婚姻移民权利保障的视角出发,并且很少参考其他具有相似现象的国家和地区治理跨境婚姻移民的政策经验,仅局限于狭小的本地化语境中进行探讨,未能对解决跨境婚姻移民治理与移民及其家庭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有效建议。

(三)台湾跨境女性移民研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台湾学者就开始对来自大陆的婚姻移民进行研究,伴随东南亚各国女性劳动力移民和婚姻移民的大量涌入,台湾学界对跨境女性移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台湾学者对整个国际移民性别化研究在观点、理论、方法,以及政策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南南区域中促进地区与女性移民共同发展的示范基地。台湾地区研究的特点在于:一是从跨国视域而非本土视域研究;^⑤二是将女性移民作为研究主体,以保护这一群体的权益为研究出发点,分析女性在劳动力移民和婚姻移民之间的身份转换、强调女性移民对当地社会的价值和贡献,通过梳理女性移民区域迁徙的商业化链条,分析女性移民在多重权利结构中受到的压制;^⑥三是政策制定者与学界、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构成了女性移民被接纳和融入的良好政策和社会环境,并通过完善的社工组织对女性移民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⑦

回顾我国学者开展的女性移民研究,不难发现:首先,伴随世妇会的召开,性别/妇女研究学科的发展,性别视角已成为女性移民研究,尤其是国内农村-城市流动妇女研究中最重要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其次,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已成为了我国跨国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但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展开,仅有少量研究运用了跨国视角、性别研究视角,在当前的研究语境下,跨国女性移民更多地被视为影响边境安全、带来各种非法社会问题的“闯入者”,她们在迁徙过程中的能动

① 谷家荣.地域、身份与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婚姻调查[J].青海民族研究,2009,(4).

② 杨晓兰.桥头堡建设战略下中缅边民跨境婚姻管理创新探索[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③ 孙卫.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研究——以临沧市为例[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3,(4).

④ 雷明光,王保同,等.我国边民跨境婚姻家庭的困境与思考——以云南、广西边境地区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⑤ 游素玲.跨国女性研究导读[C].台北:五南,2011;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⑥ 马宗洁.压迫概念之认识:以服务新移民工作者为例[J].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11,(2).

⑦ 陈芬苓.女性新移民生活状况的转变与政策意涵[J].东吴社会工作学报,2014,(27).

性,在跨国空间中对原籍国家家庭、社会,对新组建的跨国家家庭、边疆地区发展的价值贡献,与跨境生活中遭遇的生存困境和脆弱性却很少成为研究的重点;再次,有关女性移民研究的论著较多,但对移民理论的实践运用却是相对滞后的,大多数研究仍在采用诸如推-拉模型等较老的理论工具进行女性移民研究分析,不仅不利于移民实证研究的理论提升,不利于移民研究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交流,而台湾地区有关女性移民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海峡两岸形势,未能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尚未汇合提炼成为我国移民女性化研究的经验和方案;最后,我国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移民接收国立场之上展开的研究,而忽略了我国同时作为传统移民输出大国的身份,仅有极少量的研究关注到输出女性移民,且实证研究较少,向外输出的女性移民较多地出现在海外旅居作家的笔下,而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一再缺席。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构建

2017年2月和11月,联合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广泛支持,以及对中国在新时期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新实践的拥抱。可以预见在区域化、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之下,未来有关移民和性别的研究还将成为全球治理、国际学界共同参与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这场有关女性移民的国际讨论中,中国学者不应该缺席。尤其是伴随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开展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建构的紧迫性更为突显。这既是由于我国作为国内人口流动的大国,国内移民治理问题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国外经验,无论是处理农村-城市人口流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养育和照料问题,还是保护流动妇女权益,促进乡村与城市共同发展都需要积累更多有关流动妇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因为我国同时兼具移民输出/输入国身份,开展输出和输入两个流向的女性移民研究,不仅有利于识别流动妇女的价值,更有利于通过女性移民流动的力量,消除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和质疑。故而,开展全球女性移民的中国建构,是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之举,是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之行,更是促进国内与国际妇女发展事业之需。

构建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须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

首先要汇合海峡两岸关于女性移民研究的相关成果,提炼有关国内外妇女流动研究和治理的中国经验。大陆学者在国内农村-城市妇女流动、边疆地区跨境妇女流动研究中的实践研究经验,是可以并也应该与台湾学者对于跨海峡大陆女性移民、东南亚女性移民的研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对话。从台湾学者对入台婚姻移民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台湾学界对大陆婚姻移民多怀有同情与关爱之义,呼吁改变大陆婚姻移民领取相关证照要比他国婚姻移民时间延长2年的政策现状,减少对大陆婚姻移民的歧视也是学者们普遍的表达。因此,无论是从联络海峡两岸学者的学术情感,促进彼此在相关研究议题和观点上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海峡两岸有关全球移民研究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借鉴台湾地区学界和社工组织形成合力促进女性移民融入、治理与发展方面的经验来说,促进两岸学者的互动交流都是构建全球女性移民研究中国话语的第一步。

其次要扩大女性移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在继续将国内农村-城市流动妇女研究作为我国女性移民的研究重点和特色的同时,更要拓展对境内跨国流动妇女的研究类型,转变仅以婚姻移民为研究对象的固化研究思维,将劳动力移民、经商移民和留学生等多种类型的女性移民纳入研究视野,另外我国向外输出的女性移民也应该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扩大研究对象和视域范围之时,应该将南南区域内的女性流动作为我国构建女性移民研究学术话语体系的重点,尤其是关注我国在亚洲区域内,与周边国家、其他国家之间妇女的双向流动。南南区域内部国际移民的一个有别于南北移民的重要特征就是:非规范/无证移民成了一种主要的移民类型。无证移民对区域输出和输入国的治理都形成了困境,“例外的状态”同时又使移民远离于法律保护之外,成为边缘的他者。因此,在研究中要具有性别、区域共同治理、共同发展这三种意识,并要理解移民与接收国长期以来存在的血缘、族群与文化网络。

最后要充分吸收移民理论和方法的最新成果,针对国际学界的观点交锋,积极开展实践研究,参与国际学界的探讨,发出中国声音。移民研究专家 Castles 认为 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移民研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不同范式、不同流派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也无被广泛认可的移民理论,学者们对移民动因的解释也千差万别。^① 尽管如此,在全球女性移民研究中,性别和发展成为了两个研究关键词,诸如全球照护链、国际劳动力的性别化分工、“汇款效应”、多元交织性等还是成了重要的理论产出与研究工具。构建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既需要吸纳与实践这些研究成果,又需要回应学界对移民与妇女发展、性别平等相互之间关系的学术争论与探讨,从性别视角,从案例入手,关注不同地区女性流动的差异,关注流动妇女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贡献,并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思考如何促进移民、国家和区域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而这些研究成果本身也将成为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积淀与支撑,成为促进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理解、认同的桥梁与路径。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global female migra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EN Xu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uthwest Borderland's Ethnic Minorities of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voice of China fac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The gender equality consciousness is in the value system. As the intersection of migration and women's development, global female migrants have become the focused subject group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the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on this group,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migrant women have developed from a non-gender perspective to the gender analysis, and the studies on domestic female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o the cities in China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the global female migration research. It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build its own discourse 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global female migration through building a migration-study community formed by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Taiwan of China, enriching the contents of female migration studies, and absorbing the brand-new methods and theori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Key wor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ender; female migrant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黄龙光]

^① Castles, S., De Haas, H. & Miller, Mark.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M].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